



东林书院： 洛闽中枢 经世致用

□ 陈 十

车马喧嚣的江苏无锡城区东门内，有一片古建筑群格外幽静，掩映在古树翠竹里的青砖黛瓦和碧波曲廊，古色古香。这里就是有着“海内百年以来言正学者，首东林”之赞誉的东林书院，自北宋年间创建以来，历经千年长盛不衰，闻名遐迩，受到历代士子的关注和仰慕。

洛闽中枢

杨时是北宋著名学者，年幼时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潜心经史，有“神童”之誉。熙宁九年，23岁时进士及第，被授予汀州司户参军，但他却辞官回乡，潜心读书治学。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时任御史的大儒程颢弃官，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开设学堂，讲授孔孟绝学，与弟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杨时在程颢门下求学，与吕大临、谢良佐、游酢并称程门四大弟子。杨时学成归乡时，“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程颢辞世已有8年之久。杨时再次北上河洛，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的伊川书院求学。此时的杨时已过不惑之年，游学四方，理学造诣功底深厚，远近闻名。但他仍然谦恭，求学一丝不苟。某日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杨时与游酢去拜见程颐，“颢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颢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由此而衍生出成语“程门立雪”，千古传为佳话。

公元1111年，北宋政和元年的秋日，长空寥廓。杨时来到江南无锡讲学。此时杨时已经58岁，距他“程门立雪”已经过去近20年。此前他学成后南归在江南常州、无锡一带讲学。这天，他游览无锡南门寺，只见保安寺前临清流，背依青山，周围古树参天，郁郁葱葱，与庐山东林寺颇为相似，是理想的讲学场所。于是萌生意念，在官员李夔的帮助下，创立“东林书社”，后改名东林书院，一直延续至今。杨时在此讲学长达18年之久，约占他一生讲学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培养了喻樗、罗从彦、李桐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后来大名鼎鼎的理



学大师、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就是李桐的门生，也是杨时的再传弟子。

今天，东林书院仪门后上方还镶嵌有清代所造砖雕门额“洛闽中枢”，这也是历代学术界对杨时将河南二程洛学传至朱熹闽学过程中所起到的“中枢”大梁作用的充分肯定。洛学南传在东林书院开道南一脉，至朱熹而集其大成，东林书院和杨时承上启下、肇路蓝缕之功无可替代。

东林书院成为宋代理学南传第一要地。杨时受业门人几乎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我国东南各地，弟子高足众多，受业门人多时达千人之众，史上亦有“龟山弟子遍天下”的佳话。

杨时在常州、无锡等地的嫡传高徒也不乏其人。据明欧阳东凤《晋陵先贤传》云：“先生一传而得邹得久，喻子才（樗）。再传而得尤延之（袤）。三传而得李元德（祥）、蒋元贵（重珍）。至今绍延学脉，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喻樗长期居于东林书院追随杨时，东林书院自杨时离去后，喻樗继任山长，是江南延续杨时学脉思想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对程门理学在江南的继承、传播及进一步深化发展均有重要贡献。

经世致用

明代，无锡人文之盛，称重江南，文会、诗社等遍布城乡各地，义学、书

院这些民间私人所设立的讲所也有相当的规模。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祖籍无锡上舍里，出生于江南望族的顾宪成被罢官回到家乡无锡泾里，设“同人堂”讲学。此时顾宪成已是一派宗师，声名远播，又有正直贤臣之名，受到学子推崇。许多人慕名前来求学，很多已考取功名的有才之士也前来求教。求教之人众多，顾宪成不得不专门开辟了几间学舍供学子居住。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知会无锡县令，在其一再恳求下，地方官府同意在原址修复东林书院。工程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正式动工，至九月全部修复完工。十月，顾宪成等人召开集会，依据《白鹿洞书院学规》订立《东林会约》，将东林书院的讲学制度规范化。要求学子心怀天下、一心向学、为国尽力。东林书院或春或秋开大讲大会一次，除天寒酷暑外每月九、十、十一开小会一次，从不间断，每次讲会设会主一名，通常主讲“四书”，以其中一篇为开头，还涉及先秦诸子百家，包括历代儒释道及有关哲学、文学、史学等各家学派思想。讲完后听讲人提问、辩论、研究，对于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成果还要编辑刊印，如《会语》《东林商语》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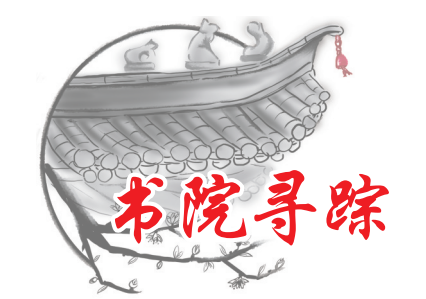
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如杨涟、魏大中、文震孟、朱国桢、刘宗周等许多人都到东林书院讲过学。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推广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践行学以致用的教育理论，从教育入手宣扬道

德，把学术和教育作为关乎国本的要素，通过诚意、正心的个人修对对社会进行改造，达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

东林书院提倡学子关心时政，寻求救世之道，提出爱国、经世致用、关心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将讲学的内容拓展到实际生活。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题写的那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则是东林书院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副名联被广为传诵，东林书院盛极一时，成为全国学子探讨理学传统文化思想以利经邦济世的重要舆论活动中心，享有“海内百年以来言正学者，首东林”的美誉。

东林人士秉公执法，致力振兴吏治，革除朝野积弊，与魏忠贤阉党集团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被阉党集团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明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矫旨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首罹其难。第二年在朝廷限期拆毁书院的严旨下，东林书院除道南祠外被夷为平地。但东林精神不灭，仅仅3年后，阉党被惩处，东林书院开始修复，从明末历经清代各朝，续有修葺，书院不仅复还旧观，而且还增加了学舍书斋，会众讲学之风历代继承，延续不断。东林书院爱国、经世致用、关心社会、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代代相传。

今天的东林书院在繁华的无锡城内陆古朴厚重，院内粉墙黛瓦，曲池长廊，院前石坊高耸，古树参天，依旧是传播文化、传承历史、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也是无锡和江南的文化地标和文脉象征。其大门悬挂的门联格外醒目，令人感慨：“此日今还再，当年道果南。”



书院寻踪

教育精准扶贫要培育家庭教育的内生动力

□ 孟 筱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扶贫，我们不仅要在学校教育方面下功夫，更要注重家庭对于儿童个体成长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部在《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发挥好家庭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传承中华民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秀传统，注重扶贫先扶智，不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追溯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家庭是培养人的教育主体，进入现代社会，学校承担起了与人的发展相关的主要教育任务。然而，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是人们接受社会化最基本的文化环境和最早的单位，是儿童时期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于成人的行为也有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家庭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社会化主体，它对于个体人格的塑造有着核心作用，因此，社会学家库利将家庭称为“人类本性的培养所”。儿童正是在家庭中建立起最亲密的感情联系，并将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内化。

贫困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生存资源和物质财富的匮乏，而实质和根源，是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地区内在资源、精神财富的萎缩。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不能通过教育而激发家庭成员的内在潜力和精神动力，那么即使有外在条件的改变，有“资源输入型扶贫”，扶贫效果也是难以持久的，因为“贫”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当前，

贫困地区家庭教育需求还较低，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知识的涌入，如果贫困家庭和乡村社会缺乏与现代教育对接的文化孕育，那么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将发生断裂，学生文化适应和掌握科学知识技能将非常困难。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学生通常会选择外出务工或回到自己原来的乡村，贫困代际传递也就很难有效避免。因此，教育精准扶贫要重视家庭教育，把目光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之中，基于对人、家庭成长的规律和家庭教育功能进行科学分析，置家庭于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中，培育家庭教育的内生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家庭探索教育脱贫的有效方式。

第一，增强家庭教育的观念意识，注重家庭教育的双向示范效应——文化传递与文化反哺。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第一责任人，首先要接受教育，率先更新教育观念。村（社区）要向贫困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支持与服务，可以把当地通过读书改变贫困面貌的家庭召集起来，与贫困群众进行经验交流，组织开展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家庭教育模范评选，表彰学习型家庭、文明型家庭。开办“家长学校”“家长课堂”，采取现场授课和“互联网+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对家长进行专业化培训，避免家庭教育实践中的盲目性。教育能力的提升在家庭文化传递过程中增强了榜样的激励和示范作用，在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中奠定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另一方面，面对时代的更新与变迁，由于子辈（受教育者）对于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能力更强，他们向传统的施教者（长辈）传递知识的“反向社会化”现象也开始出

现。现阶段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鼓励贫困地区的学校师生积极参与，通过对学生进行多元化、开放式、远程教育培训等，将新知识、新技能反哺给上一代，填补文化鸿沟，实现家庭教育的互动，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

第二，滋养文化热土，重视乡村人文环境与家庭美德建设，全面加强儿童成长自然善好的守护。任何教育都是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中，家庭教育需要通过支撑乡村精神的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来打通教育生活与个人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保持教育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亲和性，促进个体生命的展开与个体精神的活泼建构。在乡村推广“家庭与传统文化”主题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典诵读、经典传承。学校、社会组织、公益组织都可以成为活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向家庭赠送优秀经典图书、文化读本，组织儿童诵读，并鼓励儿童带动父母在家庭共读。家庭教育指导人员可以与学术研究者、乡土文化热爱者、乡村教师和贫困家庭共同合作，开发以乡土文化为课程资源的指导性家庭教育教材，使乡村儿童进一步认识自己的家乡文化，在快速变迁的社会发展浪潮中积极进行心理调适、文化适应。儿童在向家乡学习、向生活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发现家乡，更可以发现自己，进而以家乡文化为自己的成长资源，激发内心积极向上的情感，努力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第三，实践家校合作，促进社会共育，以家庭内在力量的生长助力贫困地区

区儿童健康成长。在新时代，要让家庭和家長参与到学校教育改革的实践之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同提升协同育人的质量。通过家长委员会、家校合作联合体、家校协同专业委员会等多种方式，推进学校与家庭协同育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到学校的课堂学习进行参与式观察，课后邀请家长进行评课、议课、反馈，了解学生的教育需求，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中的棘手问题，使学校和家庭向学生提出一致的要求，保持同样的原则，实现共同的教育目标。构建社会共育机制，激励家庭、学校、社会为协同育人出策出力，联系本地宣传、民政、文化、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组织部门，发挥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先进教师以及模范人物的作用，搭建社会育人平台，整合教育资源，组织社会实践活动，提高儿童的自我认识和社会参与度，逐步改变贫困家庭代际传递中所固有的理念、价值观、心理反应—互动模式和环境暗示模式，从而提升家庭的社会参与能力，增强贫困儿童置身于社会的生存自信，以家庭内在力量的生长助力贫困地区儿童健康成长。



“教育”论坛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闻名于世，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备受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所推崇。《资治通鉴》中不仅反映了兴衰治乱的道理，也记载了许多政治事务的治理之道。通观《资治通鉴》全书，可以发现古代的形式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首先是文风虚浮华丽、言之无物。这样的文风对治理国家毫无裨益，不仅会影响政治，也会延伸到军事领域。比如《资治通鉴》第202卷记载，太学生魏元忠曾经上奏唐高宗，他指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丽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乱乱哉！”魏元忠认为朝中的文风华而不实，只讲遣词造句，不追求经世致用，武官也只是求骑射功夫，而没有将精力放在战略战术上来，从而导致唐朝国力削弱，在西征吐蕃时遭遇失败。

其次是“形象工程”劳民伤财、浮华无效。据《资治通鉴》第11卷记载，西汉初年丞相萧何主持营建未央宫，刘邦见到宫殿如此壮丽，十分愤怒，批评萧何不顾连年战事劳苦而铺张浪费。而萧何却回答：“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转怒为喜，支持了萧何的做法。为此，司马光对萧何的言论进行了批驳，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王者以仁义为丽，道德为威，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他认为真正的权威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靠华美的建筑来彰显。在天下尚未安定之时，理当节俭用度，优先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

再次是以“处处留痕”代替正常工作。《资治通鉴》第192卷记载，有人告发大臣魏征偏袒亲属，唐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没有实据。温彦博在审查时认为魏征没有留下办事的痕迹，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于是魏征上奏唐太宗说：“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魏征坚持认为，上下级之间要以诚信相待，如果事事都过于追求“留痕”，会损害双方合作共事的信任基础，不利于正常工作。

同样，从《资治通鉴》中也能归纳出几种破解形式主义的方法。

首先是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正如唐太宗所说：“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当面对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人际关系，领导者必须要保持一颗淡泊简易之心，通过身体力行、以上率下，达到“躬化易于上风，体训速于草偃”的目的，以此来阻断形式主义生长的土壤。比如，《资治通鉴》记载后周太祖郭威提倡质朴简易，不喜浮华，在立国后他对大臣们说：“文武官有益国利民之术，各具封事以闻，咸宜直书其事，勿事辞藻。”鼓励各位大臣直言上书陈事，不须修饰整饬。北魏时期，大臣们曾经请求加固京师城墙，修缮皇宫建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同意，认为国家的建设“在德不在险”，治国安邦关键在于人心向背、德行薄厚，不能过于注重外在形式。

其次是注重提升官员考核的实效。中国古代从秦汉开始都非常注重官吏的考核，到唐朝日趋完善。通过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核，来端正其为政态度，提升其治理能力，减少敷衍塞责行为的出现。但是，官员考核如果只注重形式而忽略效果，也会容易衍生出新的形式主义。为此，《资治通鉴》中特别强调了官员考核要注重实效。比如第73卷记载了司马光对东汉考课之法的议论，反对依赖于繁琐的考核程序来判断官员的业绩，避免官员考核流于形式。

再次是精简政务。破除形式主义必须精简政务，减少不

必要的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资治通鉴》第43卷记载了东汉时期光禄勋杜林的上奏。杜林认为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以致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光武帝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提出要精简官吏，考核实绩，精简政务，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最后是重用厚重质朴之士。对于厚重质朴的名臣名将，《资治通鉴》中多有称赞，比如西汉周勃“重厚少文”，丙吉“为人深厚，不伐善”，东汉吴汉“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达”等等。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需要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选用这些厚重质朴、不尚华丽的高尚君子，罢黜那些华而不实、虚浮缥缈的投机之人，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又一关键。

历史文化

典籍

从《资治通鉴》看如何力戒形式主义